

阿非利卡人的土地观念 与殖民南非*

孙红旗

内容提要 17世纪下半叶，荷属“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从北欧出发，占领了南部非洲的开普，并以此为据点，逐步向北和向东开拓，最后占据了整个南非。也正是在此殖民过程中，荷兰人成为了阿非利卡人，几乎成为南非所有土地的主人。荷兰人殖民扩张的主要思想渊源，也是最具理论性和法理性的武器，就是“无主土地”的观点。在这种深层心理根基的积淀下，荷兰人及其后裔阿非利卡人大肆掠夺原住民土地。在今天看来，在土著民族和主持公正的世人眼里，以荷兰人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编造的这种“无主土地”的神话无疑是一种强词夺理的强盗逻辑。

关键词 南非 荷兰人(阿非利卡人) “无主土地” 殖民

作者简介 孙红旗，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徐州师范大学亚非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徐州 221116)。

荷兰是近代最主要的欧洲殖民国家之一，也是继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殖民主义的先驱。由于种种原因，荷兰人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地相继丧失殆尽，只有南非，最终成了荷兰殖民者最大的、永久性的海外家园。关于荷兰人及其后裔阿非利卡人¹侵占南非的史实和过程，无论是殖民主义史，还是南非历史著作，都有详尽的叙述。^④荷兰人何以要鸠占鹊巢，强占南非原住民的土地？这似乎不是个问题，因为在许多具有一般历史常识的人看来，无论什么样的殖民主义者，其本性就是要强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土地。其实不全然如此，因为殖民主义发展史可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点，如最初的海盗式烧杀抢掠；商业扩张阶段的“贸易尾随国旗”；以掠夺劳动力为主要目的的贩卖黑人奴隶；以经营经济作物为赢利手段的“跑马圈地”；以“无形帝国”方式为主的新殖民主义，乃至以政治控制和文化渗透为主要表现的所谓“后殖民主义”等。对此，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作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殖民者为什么要在南非安营扎寨，并演变为南非广袤土

* 本文系江苏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¹ 到达南非的荷兰殖民者本来都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号称“布尔人”(农夫)。18世纪初，他们开始摆脱公司的控制，并自称为“阿非利卡人”(非洲人)。本文中的荷兰人、布尔人、阿非利卡人基本上都是指荷兰殖民者及其后裔。

^④ See Such as D. K. 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s: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1982; L. M. Thompson,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中国学者的著作，如葛洪著：《南非：富饶而多难的土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张象主编：《彩虹之邦新南非》，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地的主人?除了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逻辑之外,¹本文试图从心理史学的角度,即主要从荷兰人的土地观念层面探讨他们殖民南非的根本动因。

—

恩格斯曾指出:“我们称之为思想观念的东西”能“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④荷兰人殖民扩张的主要思想渊源,也是最具理论性和法理性的武器,就是“无主土地”(terra nullius)的观点,特别是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系统性阐释。在今天看来,在土著民族和主持公正的世人眼里,以荷兰人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编造的这种“无主土地”的神话,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无疑是强词夺理,是历史的虚构,^⑤已经被批驳得体无完肤。但问题是,在今天看来属于“强盗逻辑”的观念,在历史上却是殖民主义者握在手中的一把“利剑”,是当时最先进的民族国家中普遍存在于广大民众之间,甚至深深植根于他们心目中的一种思想意识。正是凭着这种被殖民者广为接受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观念,对于抢夺南非黑人土地的行为,荷兰人(阿非利卡人)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且显得“理直气壮”。“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也就是说,阿非利卡人后来展示的那种贪得无厌的掠夺他人土地的行为首先有深层的社会民众心理基础。

作为一个来自欧洲的西方民族,阿非利卡人的土地观念与南非当地的非洲原住民的土地观念迥异。“无主土地”是西方普通法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它反映的是西方社会普通民众中长久积淀下来的一种文化心态,即是一种深层社会现实的表述。在为欧洲人征服“非我族类”并占领其土地的行为进行法律正当化的过程中,在“无主土地”这一法律神话的背后,有它自己的哲学基础的支持,即欧洲人普遍奉行的自然法哲学和以民族国家利益为轴心的实证主义。自然法哲学倾向于承认欧洲的种族优越与文化中心理念,对殖民者视原住民为“野蛮落后”的民族因而不配成为“国际家庭”中的一员这种观点,给以正当性与合法化。这样,落后民族只是国际法的客体而非主体,欧洲人负有将他们基督教化的职责。在欧洲人眼中,原住民几乎没有,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与社会建构,遑论法律,特别是缺乏任何足以作为欧洲法律所确认的确凿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故而欧洲人有义务引领他们达到先进文明的标准。即便原住民确有一套财产法律制度,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认土著法律的存在,但因为这些法律是“异教的”,非基督教化的,因而也就可以不予承认。^⅔这样,原住民的领土便经历了一个从“被发现”到作为财产“被占有”、被掠夺的根本转变。^½“就真正的农业殖民地而言,——不只是由于它拥有尚处于自然状态中的大量肥沃的土地。而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这些土地还没有被人占有,还没有受土地所有权的支配。就土地来说,造成古老国家和殖民地之间巨大区别的,正如威克菲尔德所正确指出的,是土地所有权的法律上或事实上的不存在。”^¾

荷兰人是继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之后在世界进行殖民活动的先驱之一,业已铭刻于心的“无主土地”的普通法原则无疑成为他们到处强占原住民土地的利器。荷兰人和以前所有殖民者的区别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基本上是封建君主制国家,而荷兰人则进行了近代世界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并建

¹ 北京大学郑家馨、李安山等学者都发表过相关文章。参见静水:《布尔人大迁徙的经济因素浅析》,载《西亚非洲》,1988年第1期,第62~66页;郑家馨:《南非开普殖民地的建立和殖民土地扩张》,载《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第28~36页;郑家馨:《殖民土地扩张与南非各民族的历史命运》,载《世界民族研究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2~356页。

^④ 恩格斯著:《致康·施密特》,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4页。

^⑤ 参见郑家馨:《南非“班图斯坦”制度的历史虚构》,载照那斯图、阮西湖、葛公尚、刘兴武等编:《种族问题国际会议文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187页。

^⅔ 参见P.马修、R.杭特、H.查尔斯沃斯:《法律与历史:黑白之间》(P. Mathew, R. Hunter & H. Charlesworth Law and History in Black and White),载《比较法研究》第12卷,第4期《澳大利亚法律研究专号》,第355页。

^½ 参见许章润:《“无主土地”:一个法律神话》,载《读书》,1999年第7期,第14页。

^¾ 马克思著:《资本论》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52~853页。

立了共和制度。更重要的是，带着鲜明时代烙印的荷兰人奔走呼号，这个以商业立国的资产阶级国家第一次为掠夺异己民族土地的行为找到了法律依据。1758年，荷兰商人万忒尔（“Vattel”，或译瓦特尔）的有关国际法著作——《国家间的法律》（Law of Nations）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发行，他首次对“无主土地”的法理观念进行了明确阐释。依据他的思想，原住民的土地可以分为“已然垦殖的”（cultivated）和“未经垦殖的”（uncultivated）两类。在这里，“已然垦殖”与“未经垦殖”的另一含义即是“文明开化的”，和“未曾开化的”或“不文明的”。他认为，国际法应当确认人类族群对于其所栖身、使用的土地负有开发、垦殖的义务，据此，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失于开发、垦殖土地的状况，即意味着他们从未真正而合法地占有过这些土地。因此，这些土地，自然应由具有能力和责任心的先进民族，即欧洲人所占有和开拓。依照当时荷兰人的眼光，对于异国他乡的土地，可经由3种方式取得：一曰征服，即用强力夺取；二为“割让”，包括“自愿的”和“强迫的”割让，主要通过协议或者条约的方式获得；第三种最为理想，即占有“无主土地”。“无主土地”即是所谓的“未经垦殖的土地”，或虽然已经垦殖，并且居民已经结成定居社群。但在荷兰殖民者看来，这样的土地上并无成型的社会组织者，定居社群与土地二者之间也就不能认做“国际法”上之合理占有关系，因而其土地仍为“无主土地”。这样，根据“谁先发现谁先占有”的原则，它们仍必须向所有殖民者开放，由此被占有的土地即成为“定居殖民地”，或“移民殖民地”（settled colony）¹。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当地原住民对其所栖身的土地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这一“天然的”概念。在荷兰殖民者的眼里，原住民未有昭彰之典章文物，而“人类生活”不是法律真空，则占有者的法律自占有之日起便立即自动移入生效。欧洲人的不动产法制度，遂成为占有者们跑马圈地的一柄宝剑。^④由此可见，荷兰人“无主土地”的理念使他们在侵占南非黑人大片土地过程中具有极大的心理优势，也就是说，与非洲人的土地观念相比，荷兰人的土地观念本身即具有极大的进攻性。

二

尽管“无主土地”的观念作为一个正式的法理概念在一个世纪后才被提出来，但它无疑是第一次从实用主义角度对前人思想观念的系统总结。正是带着这种时代所赋予的土地观念，荷兰人出于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的需要，在非洲最南端建立了桥头堡。当荷兰殖民者在南非站稳脚跟后，阿非利卡人史学家和政客们就曾一再试图证明白人和黑人是从相反的方向进入同一处无人居住的广阔空间。换言之，他们进入的就是“无主土地”。而他们侵占当地黑人的土地也就显得有理有据，因为土著民族是“野蛮人”，不具备文明规制的社会组织，没有明确的土地所有权。的确，在荷兰移民与科伊桑人（Khoisans）及班图各族黑人遭遇之时，后者还处在从原始社会后期向军事民主制国家过渡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④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形态决定了他们的土地观念和土地所有制形式与远道而来的荷兰殖民者迥异。荷兰人首先遇到的是科伊桑人，包括科伊人（即霍屯督人）和桑人（或译萨恩人，即布须曼人）。在南非所有土著民族中，萨恩人的生产力水平最为低下。他们基本上属于采集狩猎民族，居住在大卡鲁（Karoo）南部山区直到奥兰治河北岸高原的广阔地带，在瓦尔河、图盖拉河和凯河的河谷地带也有他们活动的踪迹。卡拉哈里大沙漠和浩瀚的大西洋阻碍了这个处于氏族社会的原始民族通过陆路和海路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辽阔单调的南非高原为居民提供的生活资料丰富而雷同，到

¹ 参见许章润：前引文。

^④ 同上。

^④ 关于非洲原住民族的经济形态，郑家馨教授对此有专文论述。参见郑家馨：《论十九世纪以前南非的社会经济结构》载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非洲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9~77页。另可参见郑家馨：《祖鲁王国的兴起和恩戈尼人、苏陀人的迁徙》，载艾周昌、郑家馨主编：《非洲通史·近代卷》第18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4~575页。

处都是相似的产品，如羚羊、浆果、野生块根、蜂蜜和鱼类等，这使他们能够较为容易地生存下来，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天然就能出产大部分生活资料和食物”¹，因为这种状况不利于促进社会分工的形成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④过于依赖土地上的自然物产意味着他们基本上没有处置土地的能力，换言之，由于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和社会组织的十分松散，他们只能维持最简单的人口再生产，每个人都可以占有无限的土地资源。或者说，他们最大的天然财富就是土地。别说私有，就是集体占有的观念在萨恩人的思维中可能也是不存在的。而在阿非利卡人看来，萨恩人和南非大草原上的动物没有什么区别，都是阿非利卡人猎取的对象。

科伊人是最早与荷兰人打交道的南非原住民。与萨恩人相比，科伊人和前者在体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但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过渡到以自己的生产劳动来增加天然食物的畜牧经济阶段，其社会组织也比萨恩人大得多，通过人口的增殖和群体公社的扩大、分裂，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族体，确立了父系酋长制。除了小部分科伊人生活在靠近开普海岸，大部分科伊人居住在南非西部地区、小卡鲁地带。稀少的雨量和酸性土壤严重地妨碍了他们进一步把生产力提高到种植经济阶段，而一直维持着单纯的游牧生活，开普山地和卡鲁地带的周期性旱灾甚至迫使他们一度暂时退回到狩猎生活。干旱和土壤贫瘠造成牧场载畜量很低，为了减少损失和维持生存，科伊人往往需要占有十分庞大的牧地面积，每个家庭公社都拥有几个冬季和夏季牧场，轮回放牧，粗放经营。尽管地权不固定，但集团共有几处土地（牧场）的观念已经在他们的心目中确立下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族体的分裂，各个氏族之间为争夺牧场、水源和劫掠畜群及妇女的战争也时有发生，在荷兰移民来到开普之前，科伊人各个族体之间已经出现土地（牧场）资源紧张的现象。正当科伊人在向部落联盟迈进的时候，荷兰人闯了进来，尽管科伊人对这群不速之客进行了极其顽强的抵抗，迫使后者向开普北部地区的殖民扩张推迟了30年，但像美洲殖民者对待印第安人那样，荷兰人几乎剿灭了科伊人，以及正向畜牧经济过渡的萨恩人，把他们的土地资源据为己有。在荷兰移民者眼里，科伊人和萨恩人没有什么区别。在还没有建立基地之前，殖民先锋范·里贝克就向东印度公司提交过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他先前到达开普时所获得的印象，他提醒说，科伊人是危险的野蛮人，“绝不能信任他们，他们是凶残的民族，没有良知”^④。在他那小心翼翼保存的日记中，同样能发现他诬蔑当地人的恶毒话语。

三

如果说萨恩人和科伊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停滞不前的话，班图人的制度和文化则要先进得多，他们已经进展到了牧农混合经济阶段。当阿非利卡人正在蚕食萨恩人和科伊人的土地向东方扩张的时候，来自东非的班图黑人早已在几个世纪前跨过林波波河，继续向南方迁徙。在未迁入南非之前，班图人生活在萃萃蝇繁衍的东非地区，无法大量地放牧牲畜，所以他们的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由于班图人世世代代焚荒开地，植被遭到破坏，引起水土流失，严重地影响了生态平衡，造成地力耗尽。因此，班图人无法在同一地方居住很长时间，因而不得不持续地向南方迁移，在他们身后则留下一堆堆废墟。带着他们的铁器文化——锄头和矛，班图人统治了当地的科伊人和桑人，同时学会了放牧牲畜，而后者逐渐融入黑人社会，除了部分撤进了刚果森林最深处、西南沙漠和非洲最南角的谷地。黑人迁徙较慢，儿子进入成年后，便结婚离家，新建一个自己的“家”（Kraal），作为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1页注4

^④ 同上书，第561页。

^④ C. Louis Leipoldt *Jan van Riebeeck*, London, 1936, p. 90

氏族的延伸。老一辈死了，他的“家”就被放弃，子孙不得据为己有。这样就消除了紧张关系，避免了冲突。除了代代迁移外，黑人还有季节性迁徙，各个族体赶着他们的牛羊来往于海岸酸草地（Suurveld）和内陆甜草地之间。他们在高地放牧，然后在冬天赶到温暖的酸草地区（阿非利卡人后来称之为海岸牧场），让甜草地得到恢复。这样，黑人部落以一个缓慢、起伏的节律逶迤南行，没有时间和边界。这是一个易于生活、低度紧张的社会，但它的宁静依赖于有大量的土地和空间来化解竞争。在班图人社会里，对人的控制被认为远比对物的控制更重要。这在一句东非谚语中得到体现：酋长统治人，而不是统治土地。原则上所有族体成员都对土地拥有权力，因为土地是这些民族社团最基本的生活因素，拥有土地在他们的法律和社会含义中极其重要。

而阿非利卡人一再宣称他们拓殖的土地“实际上未被占据”，他们要么是误解了非洲人的土地关系，要么纯粹是要歪曲和否定非洲人土地所有制的功能特征。他们利用班图各民族土地“公有”和产权不明确的特性，通过贿赂酋长、签订租界条约等方式鸠占鹊巢，蚕食和侵吞土著民族的土地，¹或者干脆赤裸裸地抢占班图人的领土。他们先是一步步地掠夺和强占科伊桑人的牧场，然后又在大批迁徙中屡屡进犯祖鲁人的家园。1838年12月16日既是阿非利卡人的“神圣契约”日，同时也是祖鲁人的“丁刚节”，这其实也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土地观念的尖锐冲突。阿非利卡人认为祖鲁人的土地是神赐给他们的，而他们献给上帝的祭品却是祖鲁人的“血河”。为了证明南非的土地占有状况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南非官方精心炮制的《南非》一书这样写道：“今日黑人的祖先在南迁以前显然经常居住于中非的大湖区域。他们进入今日南非地区的时间大约与首批白人到达好望角的时间相同”^④。在另一本由南非国家情报部编写的《南非的多民族发展的现实》一书中，阿非利卡人煞有介事地写道：“18世纪70年代，在离开普敦1000公里的地方，阿非利卡人迁徙大军与来自中非大湖区域附近的第二次迁徙运动的前哨人员相遇。看来，在15世纪末这些部落已经迁徙到今日赞比亚、罗得西亚和莫桑比克。大约在17世纪，他们渡河进入今日南非共和国境内，这个时间与阿非利卡人的自由农场主从好望角向内地扩张大致同时”^④。南非前外长博塔在1974年10月24日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发言时，竟自欺欺人地把南非的官方谎言公开向全世界发布：“大约在17世纪中叶，南部非洲的白人和黑人相遇于本大陆一个几乎无人居住的地方”^⑤。更有甚者，在1975年6月6日于洛杉矶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名南非学者（C. P. Mudler）大放厥词：“班图人不是土著。他们是在荷兰人和英国人之后才到达（南非）的”^⑥。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南非历史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根本没有关于非洲殖民以前历史的章节。黑人学生被教导说，他们的历史是从1652年范·里贝克在好望角登陆那天开始的。1974年出版的标准第八册历史教科书中只有这样的语句：“南部非洲不是南班图人的故乡，他们与白人一样是移民……，无法确知他们迁徙运动的前锋是何时到达南非的，但有迹象表明是在15世纪或稍早一点。”^⑦这些官方教科书一手遮天，无视从林波波河南岸到开普东南部证明黑人于公元后几个世纪早已到达该地区的考古发掘的实证材料。按照阿非利卡人的逻辑，既然南部非洲不是班图人的故乡，那么迁徙的布尔人进入的自然就是“无主土地”，他们是根据“先发现先占有”的原则占据了南非87%以上的土地；至于黑人现今占有的大约13%的土地就是历史上他们祖辈居住的土地，“现今除两小块地区外，南非境内所有原属班图人的区域仍为班图人所

¹ 如1839年10月布尔人欺骗几名苏陀人酋长签名画押作证，取得了对原由姆齐利卡齐统治的土地所有权。

^④ South Africa, Pretoria 1978, p. 82

^④ Stat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ulti-National Development in South Africa: The Reality, Pretoria 1974 p. 22. In Marianne Comevin, *L'apartheid: Pouvoir et Falsification Historique*, Paris UNESCO, 1979 p. 78.

^⑤ Marianne Comevin op. cit.

^⑥ *Courrier de l'Unesco* Novembre 1977, p. 10

^⑦ Marianne Comevin op. cit., p. 79

有”¹。这种“无主土地”的“天然”理念仍可在至1994年为止南非一些阿非利卡人的公开言论中找到回音。

历史的发展颇具戏剧性。20世纪90年代,阿非利卡人的阶下囚——黑人领袖曼德拉成为白人总统德克勒克的座上宾,并在1994年成为新南非首任总统。黑白似乎颠倒了过来(可否改为:黑人与白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转变),但双方经济关系的实质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无论是曼德拉,还是他的继任者姆贝基,要解决南非历史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土地问题,不得不从土地所有权着手,但要把被阿非利卡人强占了几个世纪的所谓“无主土地”从他们手中索回,并非像改变政权或者政治地位那般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实现,而必须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力气。具有讽刺意味而又无奈的是,南非黑人政府只能根据“愿买愿卖”的政策,从白人手中赎回部分土地,或者原住民的后代在能够出示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以证明他们在历史上对某片土地拥有所有权的,即证明他们要索回的土地不是“无主土地”的情况下,才能合法地拥有历史上本属于自己的土地,而由于上述原因,要否认“无主土地”在法律取证上是何其难也,因而至今在这方面进展不大。这在某种程度上,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无疑制约着南非经济合理健康地发展,但南非的进步和未来也就在于此——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终究会靠民主、法制反过来解决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结 语

本文最后要强调的是:尽管“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产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④。因此,从另外一个视角探讨一下和阿非利卡人土地观念相关的意识形态与其殖民南非的关系,不仅是个心理学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个历史学的理论认识问题。仅仅从道德层面谴责殖民主义的罪恶,或者仅仅从政治经济的表象来看待和解决历史问题,都不能从根本上达到施政的目标。尽管面临来自成千上万的黑人群众的巨大压力,^(四) 尽管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宿怨依然难解,但南非新政府的英明之处就在于他们认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作为阿非利卡人和班图黑人的杰出领袖,德克勒克和曼德拉充分地意识到南非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德克勒克勇敢地释放了曼德拉,而曼德拉也以更宽广的胸怀表示不仅要解放被剥削者,还要解放压迫者。因而南非没有像津巴布韦那样采取急进的或者激烈的“土改”措施,不是简单地在一夜之间强行将土地的主人由白人变为黑人,而是不断探索土地改革的新途径,有序地清理殖民主义的遗产,实现将仍被白人占据的“无主土地”转变为社会共有财富的长远目标。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贾丽华)

¹ [美国]约翰·根室著:伍成译:《非洲内幕》(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61页脚注。

^④ 恩格斯著:《致符·博尔吉乌斯》,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页。黑体字为原文所强调。

^(四) 据1999年6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曼德拉执政5年来,土地改革使3.3万户黑人重获土地,共17.9万公顷。这离广大黑人的要求相去甚远。

Re- surveying the Event of September 11: A Dissection of the U. S ' s Counter- Terrorism Strategy (1 of 2)

Ma Lirong

pp. 5- 10

Since the Event of September 11, a great deal of the facts have proved that based on the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energy geography and culture, the United States has taken the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of the event to define the "green menace" as the "ingined enemy", which potentially accords the real demand of the U. S for hegemony in the name of counter- terrorism.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defined the U. S military operation of revenge as the "battle of the world" and even as the "battle of the

civilized society", and divided the world by "whether stay with us or stay with the terrorists", hoping that the other countries of the world would think that "attacking one country is attacking the whole" so that the whole world could be united. In order to assort with the government's counter- terrorist strategy, the U. S media have carefully created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s by disintering the world significance of the event of September 11 and playing up the news topic of "changing everything".

China' s Strategic Choice for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South Africa (1 of 2)

Yang Lihua

pp. 11- 16

Under the situation of glob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diversity, conferring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ing powers are playing an unneglectable role in building the worl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order, which is prov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outh Africa cooperative relation. Since the diplomatic relation were established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frica for nearly ten years, the bilateral common understanding has been deepening and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political mutual trust

economic mutual benefit and international mutual assistance is forming. From enhancing understanding to deepening perception, China and South Africa have extensive common stance and cooperative basis on their own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policy and in meeting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very effective consulting mechanisms have been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two sides. China- South Africa relation will go mature and stable in the future.

Afrikaanners' Land Conception and Their Colonizing South Africa

Sun Hongqi

pp. 29- 34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as the most powerful colonialists of the world then, the Netherlands occupied first Cape and then to the east the whole of today's South Africa, during which the Netherlands became Afrikaanners and the owners of almost all South African lands with many high-

sounding reasons. This paper mainl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land cognition of the Netherlands colonialists and their practice in colonizing South Africa, to reveal the colonialists' mental process of colonizing South Africa and spoiling the land of native people.